

DOI: 10.14015/j.cnki.1004-8049.2018.9.003

鲁义、李庭宇:“中日两国外交战略与特点再分析——以2013—2017年两国领导人出访为中心”,《太平洋学报》,2018年第9期,第24—34页。

LU Yi, LI Tingyu, “A Reanalysis of Diplomatic Strategies and Characteristics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Centered on the Visits of Leaders of the Two Countries in 2013-2017”, *Pacific Journal*, Vol. 26, No. 9, 2018, pp.24-34.

中日两国外交战略与特点再分析

——以2013—2017年两国领导人出访为中心

鲁义¹ 李庭宇¹

(1. 国际关系学院, 北京 100091)

摘要: 中日两国新的领导人上台后, 对外交工作都极为重视, 五年间两国领导人的外访足迹遍布全球。本文采用统计量化的方法, 对两国领导人出访的基本情况、访问特点、外交取向, 以及两国的外交重合度等进行比较研究。结果显示, 两国领导人在外交战略、首访国家、访问目的、访问侧重点等方面均表现出明显的不同。而中日两国外交重合度高, 反映出明显的竞争态势, 竞争激烈的区域主要集中在两个群体, 即与大国和中国周边国家的关系方面。

关键词: 中日领导人; 外交战略; 出访特点; 外交重合度

中图分类号: D8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8049(2018)09-0024-11

三年前, 笔者曾以2013—2014年中日两国领导人出访为例, 对两国外交战略与特点进行比较研究。^① 转眼间三年过去, 中日两国领导人执政均已超过五年。在这五年里, 国际形势和中日两国自身状况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外交方面, 两国都做出了极大的努力, 可圈可点之处不少。笔者在此前研究的基础上, 继续收集相关资料与数据, 意在将近五年中日两国外交战略与特点做进一步的比较研究。

一、比较的基础: 条件的限定

众所周知, 进行比较研究, 最重要的是比较

对象条件的选择。两者要具有同一性, 而且同一性的属性越多, 可比性就越强, 得出的结论就越充分。对两国领导人的出访活动进行比较当然也是这样。笔者首先选取以下要件作为比较的基础。

(1) 时间限定。2012年10月中共十八大召开, 选举产生了新的领导集体, 习近平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在翌年3月召开的全国人大会议上, 习近平当选国家主席, 李克强当选国务院总理, 中国新一届领导集体和领导人由此产生。五年之后的2017年10月, 在中共十九大会议上, 习近平继续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2018年

收稿日期: 2018-04-20; 修订日期: 2018-08-11。

作者简介: 鲁义(1953—), 男, 辽宁葫芦岛人, 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系教授, 博士生导师, 主要研究方向: 日本政治与中日关系; 李庭宇(1995—), 男, 北京人, 国际关系学院国际关系专业硕士研究生, 主要研究方向: 东北亚国家关系。

① 鲁义、武晓龙、程岩峰:“中日两国外交策略与特点的比较分析——以2013—2014年两国首脑出访为例”,《日本研究》,2015年第2期,第15页。

3月连任国家主席, 李克强连任国务院总理。

在邻国日本, 2012年12月安倍晋三领导的自民党在大选中获胜, 一举推翻民主党政权。安倍梅开二度, 时隔五年后再次出任内阁总理大臣。此后, 安倍两次改组内阁并调整党内人事安排, 巩固其执政地位。2017年10月日本大选, 安倍领导的自民党以压倒性优势再次获胜, 安倍得以继续连任。

可见, 中日两国新一届领导人大致是在同一时间段开始执政的, 而且连选连任, 目前还在执政中。因此, 笔者选定的比较时间跨度为其执政的前五年, 即2013年1月至2017年12月。

(2) 职务限定。《日本国宪法》中没有关于国家元首的规定。天皇只是“日本国的象征, 日本国民整体的象征”。^① 日本国家和政府的外交活动, 作为其代表者和主要实施者, 是由内阁总理大臣来承担的。现在, 安倍首相作为日本领导人, 他有两个身份, 即在国会中占据多数席位、处于执政地位的自民党党首, 同时又是政府首脑——内阁总理大臣。

中国方面与之相对应的是国家主席和国务院总理。因为从中日两国外交活动的实践考察, 中国国家主席和总理曾多次接受日本首相邀请访日或赴日参加活动, 而日本首相也多次接受中国国家主席或国务院总理之邀来华访问或参加活动, 两者关系比较对等。因此笔者认为, 本文对中日两国领导人出访活动进行比较的主体, 中方领导人除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之外, 还应包括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这样, 中日双方的比较才能更加对应和符合实际。

(3) 内容限定。国家领导人作为其国家和民众利益的代表者, 外交活动无疑是其履责的一个重要方面。中外学者对此早就有过精辟的总结, 称“外交是内政的延续”, 可见两者的密切关系。国家领导人的外交活动形式多样, 内容丰富, 同时又是双向和互动的, 出访之外还要接待来访。由于国家领导人的外交活动比较繁杂, 涉及内容众多, 因此本文仅限定一个方面, 即对中日两国领导人的出访情况进行研究, 并对其主观因素和外交取向做出分析。

二、外交战略与指导思想比较

中日两国新一届领导人上台后, 对外交工作都极为重视, 相继开启了足迹遍布世界五大洲的外交之旅。除密集的出访活动外, 中国领导人对外交工作的整体布局以及今后如何推进, 做出了总体考虑和细致谋划。五年间, 中方专门为此召开的外交工作会议就有三次。

2013年10月, 中共中央召开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 研讨周边外交形势并做出部署。习近平到会讲话, 他强调, 要更加奋发有为地推进周边外交, 为中国发展争取良好的周边环境, 使中国发展更多惠及周边国家, 实现共同发展, 并提出了“亲、诚、惠、容”做好周边外交的基本方针, 反映出中国领导人对周边外交的高度重视和全新认识。

2014年11月, 中共中央召开外事工作会议, 中央政治局常委悉数到场, 国务院各部委和省级地方政府负责人出席。习近平在讲话中强调, 要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 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 统筹发展安全两件大事, 牢牢把握坚持和平发展、促进民族复兴这条主线, 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为和平发展营造更加有利的国际环境, 维护和延长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为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有力保障。

2017年10月, 中共十九大召开。习近平在报告中对中国的对外方针做了进一步明确的阐述, “中国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 “坚持和平发展道路,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构建新型国际关系”。^② 同年12月, 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开创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 中央召开年度驻外使节工作会议。

^① 马桐山等主编:《简明日本百科全书》,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4年版, 第183页。

^② “习近平十九大报告”, 新浪网, 2017年10月18日, <https://news.sina.com.cn/o/2017-10-18/doc-ifymyxw3516456.shtml>。

习近平接见会议代表并讲话。他强调,做好新时代外交工作,首先要深刻领会党的十九大精神,正确认识当今时代潮流和国际大势。放眼世界,我们面对的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当前我国发展既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也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他勉励外交战线全体同志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锐意进取,开拓创新,深入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继续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贡献力量。^①

连续几年,结合当前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专门召开如此高规格的会议对外交工作的重要性做出全新的阐释和具体部署,而且最高领导人亲自到会并讲话,这是以往没有过的。

在日本,安倍上台后也强调对外关系和外交工作的重要性,提出了日本的外交战略,这集中反映在历年新年伊始他所发表的施政演说中。2013年1月,安倍在首次发表的施政演说中强调,“战略性外交”“重视普遍价值的外交”以及维护国家利益的“主张型外交”是他的外交基本原则。为了强化日美安保体制,日本将发挥更大的作用。日本强烈要求朝鲜为一揽子解决包括绑架、核、导弹在内的各项悬而未决的问题而采取具体行动。钓鱼岛(日本称“尖阁诸岛”)是日本的固有领土,根本不存在需要解决的领有权的问题。日中关系是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日本要求中方回归“战略互惠关系”这一原点,避免因个别问题影响整体关系。韩国是与日本共享自由及民主主义等基本价值观与利益的最重要邻国,日韩之间虽然也存在困难的问题,但日韩将携手合作。为了与俄罗斯建立起与作为亚太地区伙伴相适应的关系,日本将力求日俄关系的全面发展,同时为了解决北方领土问题,缔结和平条约,坚持耐心开展工作。日本将加深与澳大利亚、印度、东盟各国等亚洲海洋诸国的合作。^② 安倍的上述讲话,反映出他对日本外交现状的思考,确定了安倍内阁未来的外交战略和基本方针。

在2014年1月的施政演说中,安倍依然沿用前一年的提法,特别强调在外交和安全保障政策方面,将继续奉行“积极的和平主义”,坚持

与巩固以日美同盟为基础的“有利于世界和平稳定”的外交方针。同时,他还明确表示,修改宪法解释以允许行使集体自卫权,并针对自卫队赴海外开展行动强调了致力于世界和平与稳定的“积极和平主义”的意义。这是安倍执政以来首次在国会演讲中明确谈及集体自卫权,“关于集体自卫权和集体安全保障问题,将参考有关报告,研究应对措施。”^③

到2015年,安倍执政已经两年多。他在对此前外交活动进行总结的基础上,在当年2月的施政演说中明确提出,日本将高举“积极和平主义”旗帜,在世界核裁军、核不扩散运动中发挥引领作用。坚持以日美同盟为基轴,推动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的调整,提高其威慑力。日本将参加非常任理事国选举,并在联合国改革中发挥作用。推动完善安保法制,继续与共有基本价值观的国家携手,以“俯瞰地球仪”的视角,积极开展外交工作。^④

在2016年1月的施政演说中,安倍再次强调从大局出发,以俯瞰地球仪的视角,开展积极的和平外交、经济外交。日本要在确保亚洲及环太平洋地区的和平与繁荣中起到引领作用,不断加深与东盟、澳洲、印度、欧洲诸国的战略伙伴关系。日本与韩国就慰安妇问题达成了最终且不可逆的解决方案,日韩作为共享战略利益的最重要邻国,建立新时代的合作关系,以确保东亚的和平与繁荣。日本将在战略互惠关系原则的基础上,进一步改善中日两国关系。日本希望与俄罗斯为解决领土问题、缔结和平条约,在经济、能源、文化等广泛领域逐步加强

① “习近平接见2017年度驻外使节工作会议与会使节并发表重要讲话”,外交部网,2018年3月11日,http://www.fmprc.gov.cn/web/zyxw/t1522656.shtml。

② 第183届国会安倍内阁总理大臣施政方针演说,日本内閣府网,2013年1月28日,http://www.kantei.go.jp/cn/96_abe/statement/201302/28siseuhousin.html。

③ 第186届国会安倍内阁总理大臣施政方针演说,日本内閣府网,2014年1月24日,http://www.kantei.go.jp/cn/96_abe/statement/201401/24siseuhousin.html。

④ 第189届国会安倍内阁总理大臣施政方针演说,日本内閣府网,2015年2月12日,http://www.kantei.go.jp/cn/97_abe/statement/201502/12policy.html。

关系,寻找各种机会展开对话。日美同盟是开展以上外交的基础。日本将继续与美国在贫困、传染病、气候变化、安全保障等各方面共同合作,共同面对。^①

在2017年1月的施政演说中,安倍依然强调,日美同盟是日本外交和安全保障政策的基础,要进一步巩固日美同盟关系。日本将继续与共同拥有自由、民主主义、人权、法治等基本价值观的国家保持合作。同东盟、澳大利亚、印度等国携手,确保从亚洲、环太平洋地区到印度洋之间的地区和平与繁荣。为了维护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日本将积极改善与邻国的关系。改善与俄罗斯的关系,对于确保东北亚的安全极其重要。日本将在日韩之间已有的国际承诺和相互信赖的基础上,面向未来、不断深化新时代的合作关系。日本欢迎中国的和平发展,充分认识到日中两国肩负确保本地区的和平与繁荣的重任,将在“战略互惠关系”的原则下,从大局出发,共同努力,不断改善关系。要继续坚持

“对话与压力”“行动对行动”的一贯方针,强烈要求朝鲜为解决核武器、导弹,以及存在已久的绑架等重要问题采取具体行动。^②

由上可见,安倍内阁的外交战略和基本方针尽管在每年的施政演说中表述不同,但主旨是清晰的,即以日美关系为基轴,大力推进“价值观外交”,提升日本外交影响力,在国际社会发挥更大的作用。

三、出访次数比较

笔者根据中日两国官方发表的信息和数据,对2013—2017年中日两国领导人的出访情况进行统计,并制作了相关图表。为了便于直观比较,表格按出访时间顺序排列,其中深颜色表示一年中两国领导人先后都访问过的国家,从中不仅可以了解两国领导人的出访次数和到访的国家,还可以据此观察其外交策略、重点指向,以及与一些国家关系的亲疏程度。

表1 中日领导人出访情况统计(2013年)

月份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李克强 习近平			俄罗斯 坦桑尼亚 南非 刚果		印度 巴基斯坦 瑞士 德国	特立尼和多巴哥 哥斯达黎加 墨西哥 美国				俄罗斯 哈萨克斯坦 吉尔吉斯斯坦 土库曼斯坦	印度尼西亚 马来西亚 文莱 泰国 越南	罗马尼亚 乌兹别克斯坦
安倍晋三	越南 泰国 印度尼西亚 美国 蒙古			俄罗斯 沙特阿拉伯 土耳其		缅甸 波兰 爱尔兰 英国	马来西亚 新加坡 菲律宾 巴林	科威特 吉布提 卡塔尔	俄罗斯 阿根廷 加拿大 美国	印度尼西亚 文莱 土耳其		柬埔寨 缅甸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中日两国官方数据和资料自行整理。^③

① 第190届国会安倍内阁总理大臣施政方针演说,日本内阁府,2016年1月22日, http://www.kantei.go.jp/cn/97_abe/statement/201601/2215803_11145.html。

② 第193届国会安倍内阁总理大臣施政方针演说,日本内阁府,2017年1月20日, http://www.kantei.go.jp/cn/97_abe/statement/201701/201216_11514.html。

③ 统计数据 and 资料整理的具体分工为:2013—2014年由武晓茏、程岩峰协助完成,2015—2017年由李庭宇、王文赫协助完成。

表 2 中日领导人出访情况统计(2014 年)

月份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李克强 习近平		俄罗斯 荷兰	法国 德国	比利时 埃塞俄比亚	尼日利亚 安哥拉 肯尼亚	英国 希腊	韩国 巴西	委内瑞拉 阿根廷 古巴	蒙古 塔吉克斯坦 马尔代夫 斯里兰卡 印度	俄罗斯 德国 意大利	缅甸 澳大利亚 新西兰 斐济	哈萨克斯坦 泰国
安倍晋三	阿曼 科特迪瓦 莫桑比克 埃塞俄比亚	印度 荷兰		德国 英国	葡萄牙 西班牙 法国	比利时 新加坡	意大利 梵蒂冈 新西兰 澳大利亚	巴布亚新几内亚 墨西哥 特立尼和多巴哥 哥伦比亚 智利	巴西 孟加拉国 斯里兰卡 美国		意大利 中国 缅甸	澳大利亚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中日两国官方数据和资料自行整理。

表 3 中日领导人出访情况统计表(2015 年)

月份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李克强 习近平	瑞士			巴基斯坦 印度尼西亚 哈萨克斯坦 俄罗斯	白俄罗斯 巴西 哥伦比亚 智利 秘鲁	比利时 法国 俄罗斯			美国	英国	韩国 越南 新加坡 土耳其 菲律宾 马来西亚 法国	津巴布韦 南非
安倍晋三	埃及 约旦 以色列 巴勒斯坦		新加坡 美国	印度尼西亚		乌克兰 德国		美国	牙买加 蒙古 土库曼斯坦 塔吉克斯坦 乌兹别克斯坦 吉尔吉斯斯坦 哈萨克斯坦 韩国		土耳其 菲律宾 马来西亚 法国	卢森堡 印度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中日两国官方数据和资料自行整理。

表 4 中日领导人出访情况统计表(2016 年)

月份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李克强 习近平	沙特阿拉伯 埃及 伊朗		捷克 美国			塞尔维亚 波兰 乌兹别克斯坦 蒙古			老挝 美国 加拿大 古巴	柬埔寨 孟加拉国 印度	吉尔吉斯斯坦 哈萨克斯坦 拉脱维亚 俄罗斯 厄瓜多尔 秘鲁	智利
安倍晋三			美国	意大利 法国 比利时 德国 英国 俄罗斯		蒙古 巴西 新加坡 肯尼亚 俄罗斯 中国 老挝 美国 古巴					美国 秘鲁 阿根廷 美国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中日两国官方数据和资料自行整理。

表5 中日领导人出访情况统计表(2017年)

月份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李克强 习近平	瑞士		澳大利亚	新西兰			芬兰	美国	德国		比利时	哈萨克斯坦	俄罗斯	德国							越南	菲律宾	老挝	匈牙利	俄罗斯										
安倍晋三	菲律宾	澳大利亚	印度尼西亚	越南	美国	德国	法国	比利时	意大利	俄罗斯	英国	意大利	马耳他			比利时	德国	瑞典	芬兰	丹麦					俄罗斯	印度	美国		越南	菲律宾					

资料来源: 笔者根据中日两国官方数据和资料自行整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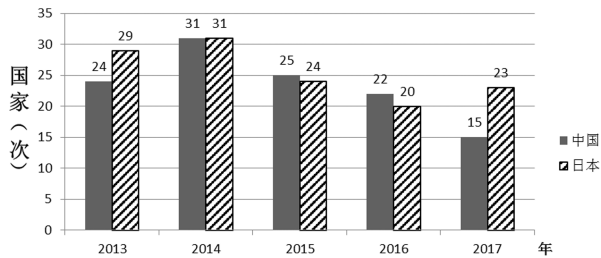


图1 中日两国领导人出访次数比较(2013—2017年)

资料来源: 笔者根据中日两国官方数据和资料自行整理。

五年间,中日两国领导人的外交活动非常活跃,出访频繁,足迹遍布五大洲。包括参加国际会议和重要多边会晤在内,中国领导人先后出访117个国家(次)。其中,2013年访问24国(习近平15国、李克强9国),2014年访问31国(习近平18国、李克强13国),2015年访问25国(习近平14国、李克强11国),2016年访问22国(习近平12国、李克强10国),2017年访问15国(习近平8国、李克强7国),平均每年23.4国(次)。

同一时期,安倍晋三包括参加国际会议和重要多边会晤在内,先后访问127个国家(次)。其中,2013年访问29国,2014年访问31国,2015年访问24国,2016年访问20国,2017年访问23国,平均每年25.4国(次)。

从以上统计可见,中日两国领导人的出访次数大致相当,反映出两国领导人的身体力行和对外交的重视程度。如果和各自的前任相

比,两国领导人的出访次数均超过其前任,被称为“任内出访次数最多”的国家领导人。

四、出访特点比较

在统计中日两国领导人的出访次数之后,笔者对其出访国家和具体行程安排做了进一步研究。通过整理分析,可以看出若干明显不同的特点和取向。

4.1 首访国家不同

一个国家、特别是像中日两国这样在地区和国际社会有着相当影响力的国家,其新一届领导人上台后的对外表现如何?首次外访选择哪个或哪几个国家?这些情况往往会引起国际社会的特别关注,成为判定其对外政策取向的风向标。中国领导人的首访是俄罗斯和非洲三国。为什么会做如此选择?中俄两国都是大国,又是近邻,两国关系一直不错,是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两国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许多重大国际问题上看法一致,在涉及对方主权、领土完整、国家安全等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坚定支持。习近平上任后,连续两年的首访均选择俄罗斯,普京总统也多次来华访问,反映出中俄关系的不同寻常。正如习近平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演讲时所说,“中俄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一组双边关系,更是最好的一组大国关系。一个高水平、强有力的中俄关系,不

仅符合中俄双方利益,也是维护国际战略平衡和世界和平稳定的重要保障。”^①而非洲国家与中国有着传统的友谊。上个世纪70年代,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能够恢复,得到了许多非洲国家的大力支持和帮助。非洲国家把中国“抬进了联合国”,中国方面始终不会忘记。为了支持非洲国家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几十年来中国对非提供了大量的无私援助。习近平上任不久就出访非洲,反映出中国对非外交的重视。习近平在访问期间多次强调:“我可以明确地告诉各位朋友,新形势下,中非关系的重要性不是降低了而是提高了,双方共同利益不是减少了而是增多了,中方发展对非关系的力度不会减弱,只会增加”^②表明中国不忘老朋友,始终把发展同非洲国家的团结合作作为对外政策的重要基础,并没有因为中国自身发展和国际地位提高而发生变化。

安倍首访选择的是东南亚三国和美国。众所周知,日美两国是同盟国,两国有着极为特殊的关系。日本的外交政策始终是以日美同盟为基轴,在许多重大国际问题上唯美国马首是瞻。战后日美关系的惯例是,历任日本首相上台后的首次外访基本上都是去华盛顿“报到”,仰其鼻息,密切关系。2013年2月安倍上任后的首次外访算是有些“小例外”。他先是去的东南亚即越南、泰国和印尼,然后去的美国,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改弦易张,不重视日美关系。在结束对东南亚三国的访问后,他急匆匆地去了美国,与奥巴马总统会谈,会见美国政要。由于行程比较仓促,有媒体评论称,是“成果与失望并存”的“华盛顿一日游”^③。安倍首访做如此选择,当然有其认真的设计和细心的考量。东南亚是日本长期以来苦心经营的传统区域,两者政治关系融合,经贸联系密切,人员交流频繁。日本始终将东南亚看做是其“势力范围”和“稳定的后方”。近年来东盟在地区和国际社会的影响力在提高,而且与中国的联系越来越密切。越南、泰国和印尼是东南亚大国,在东盟有着相当的影响力。安倍首访选择这三个国家,自然不会心血来潮、随心所欲。特别是在中国快速崛

起和中日岛争难解的特殊背景下,如何巩固日本的传统地盘,拉帮结伙为自己增力,进而弱化中方影响或牵制中国,无疑是安倍首访的重要考虑。

4.2 访问目的不同

外交是内政的延续。一个国家的对外政策和外交活动本质上是为其内政服务的。国家领导人出访既是国家形象的代表,也是宣传和扩展该国政治主张和影响力的载体,带有鲜明的目的性。中共十八大报告指出,和平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选择,中国始终不渝地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中共十九大报告继续强调,中国将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恪守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外交政策宗旨,坚定不移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同各国的友好合作,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④中国领导人出访始终围绕和平与发展的两大主题,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所到之处积极阐述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和对外政策,广交朋友,为自身发展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例如,与当今世界超级大国美国达成“不冲突、不对抗、互相尊重、合作共赢”,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共识;对周边国家,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坚持睦邻、安邻、富邻”的外交方针,将中国经济发展的红利惠及周边国家;倡议共同建设“一带一路”,即“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与相关国家的发展战略对接,相互推动,共同发展;对广大发展中国家,强调“真、实、亲、诚”的相处原则,永远做他们的可靠朋友和真诚伙伴。以此为基础,中国领导人在国际场合又相继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亚洲安全观”等战略构想,反映出中方的一贯思想和新形势下的

①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275页。

② 同①,第306页。

③ “安倍晋三访美:成果与失望并存”,美国中文网,2013年2月25日,http://www.sinovision.net/portal.php?aid=246090&mod=view。

④ 习近平:“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产党员网,2017年10月18日,http://www.12371.cn/2017/10/18/ART11508299199682101.shtml。

外交创新。中方的主张得到许多国家的赞同与支持,并写入联合国的相关决议和文件中。

安倍的出访目的也很明确,即宣传日本的政策和主张,扩大日本影响力,利用外交成果弱化国内矛盾,为国内政治服务。具体做法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其一,高调宣扬“积极的和平主义”,宣扬日本的国际贡献,表示“日本为实现国际和平会做出比以往更大的贡献”。以此欺瞒国际舆论,为其在国内修改宪法,解禁集体自卫权,推行进一步的右倾化路线,进而彻底摆脱战后体制的束缚,使日本成为所谓的“正常国家”。其二,大力推进“价值观外交”,意在结成广泛的统一阵线,牵制和围堵中国。安倍利用东海、南海以及钓鱼岛争端等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在各种场合反复强调与有“自由、民主和基本人权等共同价值观”的国家加强合作,据此提出“自由与繁荣之弧”“民主安全菱形”构想。其堂而皇之的公开主张是,“确保从印度洋到西太平洋地区的海上航行自由与安全”,但其私下的真实意图却是,在一些对中国不满或与中方因某些问题有摩擦的国家中煽风点火,挑动是非,给中国制造麻烦,甚至与其联合起来抹黑中国。其三,向目前经济出现困难,以及一些可以争取、能够利用的国家承诺援助,撒钱买好,金钱铺路,为最终实现日本的“争常”目标取得实质性进展做铺垫。安倍在所到之处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大打经济牌,承诺增加贷款、提供援助和建设基础设施。为东南亚国家提供巡逻艇和海上装备,帮助其提高“维权能力”。在非洲,日方承诺为科特迪瓦难民提供援助,将日元贷款数额翻一番。访问拉美国家,日方与其签署了一系列合作协议和援助项目,涉及领域众多,合作金额巨大。与墨西哥签署了超过14项的双边协议,与巴西签署了9项合作协议,并商定在2015年即联合国创立70周年之际,积极推进包括安理会在内的联合国改革。

4.3 访问侧重点不同

无需赘言,任何国家领导人出访都不可能遍及全球每个国家,站站停留,处处开花,必然

会有所选择,有所侧重。访问侧重点反映出访问国对某些国家或某一区域的重视程度,也在相当程度上反映出两者关系的亲疏。如表1至表5所示,中日两国领导人出访的国家都不少,足迹遍布五大洲,但在选择出访区域和国别方面却有着明显的不同。除重视大国外交,即两国领导人多次访问美国、俄罗斯和欧盟国家外,中国方面的侧重点是巩固和发展同周边国家的关系。除日本外,中国领导人访问了与中国相邻的绝大部分国家,其中包括单独出访韩国和蒙古国,实现对中亚国家的全覆盖。中国周边外交全面开花,反映出中国长期以来始终执行的外交路线,即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中国外长王毅对此总结说,中国正在走出一条结伴而不结盟的对外交往新路。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截止2016年底,中国已同97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建立了不同形式的伙伴关系。中国将在现有基础上打造更加紧密的全球伙伴关系网。^①

日本是中国的重要邻国,又是大国,两国经济联系紧密,人员交往频繁,但在中国领导人出访的国家中并没有日本。这是为什么呢?道理世人皆知。安倍上台后,肆意歪曲侵略历史,在钓鱼岛问题上坚持强硬立场,大肆宣扬“中国威胁论”,摆出了一副与中国强硬对抗的架势,并于2013年12月26日参拜靖国神社,严重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恶化两国关系。安倍的所作所为,严重挑战了中日关系的底线,使两国关系降到邦交正常化以来的冰点。12月30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安倍自上台以来,在中日关系上打错算盘,一错再错,特别是参拜供奉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对这样的日本领导人,中国人民当然不欢迎他,中国领导人也不会同他会面。”^②五年间,除在国际场合礼节性会面外,两国领导人未能实现互访。

^① 王毅:“中国将打造更加紧密的全球伙伴关系网”,新华网,2017年3月20日,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7-03/20/c_1120661741.htm。

^② “外交部发言人答记者问”,《人民日报》,2013年12月31日。

日本方面的出访侧重点是,继续发展和扩大同东南亚和中东国家以及印度的关系。前面提到,东南亚是日本长期下大气力经营的区域,在投资、商品输出、资源获取等经济发展方面,该地区对日本至关重要。两者经济联系和人员交往极为密切。在日本“争常”问题上,东南亚许多国家态度坚定,一直支持日本。安倍上台后,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三次到访东南亚,遍访东盟 10 国。五年里,在安倍每年的出访行程中都少不了东南亚国家,安倍由此成为日本历届首相中访问东盟国家次数最多的首相。而中东是日本确保能源安全供给的重要区域,日本的石油进口量约 70% 来自于该地区。安倍上台后,同样在不满一年的时间里,两次访问中东国家,足见日本对该区域的重视。印度与日本有着特殊的关系。早在 1947 年远东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时,所有法官中唯有印度法官帕尔(Radhabinod Pal)主张日本战犯无罪,日方因此对其感恩戴德。1966 年,帕尔受日本前首相岸信介邀请访日,在日本各地大肆宣扬“日本无罪论”。日方将其奉为座上宾,并授日本最高奖章——勋一等旭日大绶章,表彰其对日本所做的“贡献”。帕尔去世后,日本时任首相佐藤荣作亲自发唁电致哀。日方在靖国神社外为其树立表彰碑,还在京都风景区专为其修建了墓碑,供人瞻仰。2007 年 8 月,安倍首次担任首相后对印度进行国事访问时,专门会见了时年 81 岁的帕尔的长子,赞赏帕尔的功绩,并称“许多日本人尊敬他”。在“争常”问题上,日本与印度的想法也是高度的一致,都强烈主张对包括安理会在内的联合国机构改革。十几年来,双方一直在积极活动,联络其他国家,提出改革方案,争取早日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2015 年 12 月,日印首脑会谈并发表“日印新时代”的联合声明,双方同意推动进一步提升两国关系的“印太战略”。现在,日印两国是“特殊全球战略伙伴关系”,在诸多领域两国有着共同的利益。五年间,安倍先后三次访印,印度领导人也多次访日,足见两国关系的特殊性和紧密程度。

五、外交重合度比较

“外交重合度”是笔者在整理中日两国领导人大量的出访信息和相关资料后,为便于比较和分析而采用的概念。所谓“外交重合度”是指,甲国所努力争取的外交资源也是乙国需要和努力争取的,甲国希望交好、发展关系的国家也是乙国的朋友或外交伙伴,甲乙两国的外交努力和发展对象针对同一个第三方国家。从表 1 至表 5 的统计中可以看出,五年间中日两国领导人的外访足迹遍布全球,分别涉及 100 多个国家(次)。其中,两国领导人都曾先后访问过的同一个国家占有一定的比重,有的国家甚至是两国领导人都多次访问过。研究外交重合度,对两国关系一般或彼此不睦的国家有着特别的意义。在这种情况下,外交重合度低,说明甲乙两国的外交侧重点不同,外交取向各异,因而不会出现明显的竞争。反之,外交重合度高,说明甲乙两国外交侧重点相近,外交取向趋同,可能会导致明显的竞争。外交重合度越高,甲乙两国的争夺和竞争就会越发激烈。

为了便于比较,笔者对中日两国领导人的外访情况做进一步的整理,即对两国领导人都分别访问过的总共 100 多个国家(次)中,减去两国领导人因出席同一个国际会议而对东道国的访问;对多次访问过的国家不重复统计,只统计一次。这样,最后统计出的结果是,中国领导人访问了 59 个国家,日本领导人访问了 61 个国家。其中,两国领导人都曾先后访问过的同一个国家的数量为 37 个(如表 6 所示),占到中方外访国家数量的 62.7%,占到日方外访国家数量的 60.7%,外交重合度超过 60%。

再看外交成果及其构成分布,在上述访问过的 37 个国家中,中日两国都在经济方面取得成果的有 32 个国家,都在政治方面取得成果的有 25 个国家,都在安全方面取得成果的有 10 个国家,都在文化方面取得成果的有 4 个国家。从外交重合度的角度分析,两国对同一第三国的工作重心或者外交争夺,主要集中在经济领

域,其次是政治领域,而安全领域和文化领域则比较少。

除此之外,笔者还对中日两国领导人出席同一国际会议,以及在会议期间分别安排双边会见的情况作了统计^①。2013年至2017年的五年间,中日两国领导人共同出席的国际会议,例如G20领导人峰会、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东亚合作领导人系列会议、核安全峰会、亚欧首脑会议、中日韩领导人会议、联合国成立70周年系列峰会、巴黎气候变化大会等,共22次。其中,2013年3次^②、2014年4次^③、2015年7次^④、2016年5次^⑤、2017年3次^⑥。在每一场国际会议期间,双方都会根据自身需要,有选择地安排多场次的双边领导人会见。其间,中方总共安排双边领导人会见114国(次),日方安排双边领导人会见122国(次)。在上述双边领导人会见中,中日两国都安排双边会见的领导人有26位,涉及39国(次)。这些国家是,美国、法国、德国、俄罗斯、印度、韩国、巴西、土耳其、伊朗、澳大利亚、新西兰、越南、泰国、新加坡、印度尼西亚、菲律宾、阿根廷、蒙古、芬兰、拉脱维亚、孟加拉国、柬埔寨、老挝、哥伦比亚、秘鲁和文莱,分别占双边会见国家(次)总数的34.2%和32.0%。可见,即便在两国领导人“出席同一国际会议”这类外交活动中,中日两国的外交重合度也不低。

表6 中日领导人访问同一国家的次数统计
(2013—2017年)

领导人 国家	习近平 李克强	安倍 晋三	领导人 国家	习近平 李克强	安倍 晋三
俄罗斯	6	5	智利	2	1
比利时	3	3	埃及	1	1
哈萨克斯坦	5	1	吉尔吉斯斯坦	1	1
法国	2	3	塔吉克斯坦	1	1
英国	2	3	土库曼斯坦	1	1
新加坡	1	4	特立尼和多巴哥	1	1
印度	2	3	墨西哥	1	1
德国	3	2	马来西亚	1	1
巴西	2	2	埃塞俄比亚	1	1
乌兹别克斯坦	3	1	肯尼亚	1	1

续表

领导人 国家	习近平 李克强	安倍 晋三	领导人 国家	习近平 李克强	安倍 晋三
美国	2	2	斯里兰卡	1	1
越南	2	2	哥伦比亚	1	1
澳大利亚	2	2	沙特阿拉伯	1	1
古巴	2	1	波兰	1	1
印度尼西亚	1	2	孟加拉国	1	1
泰国	2	1	加拿大	1	1
阿根廷	1	2	柬埔寨	1	1
蒙古	1	2	芬兰	1	1
新西兰	2	1	总计	63	60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中日两国官方数据和资料自行整理。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中日两国外交重合度高,其重合部分主要集中在两个群体上。一个群体是大国、或是在地区有影响力的国家。中日两

① 此类统计是指中日两国领导人出席在第三国举办的国际会议,不包括中日两国作为东道主在本国举办的国际会议,如2016年9月在中国召开的G20杭州峰会。

② 2013年中日两国领导人共同出席的国际会议有:G20领导人第八次峰会(2013年9月5—6日,地点:俄罗斯),APEC第21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2013年10月7日,地点:印度尼西亚),东亚合作领导人系列会议(2013年10月9日,地点:文莱)。

③ 2014年中日两国领导人共同出席的国际会议有:第三届核安全峰会(2014年3月24—25日,地点:荷兰),第十届亚欧首脑会议(2014年10月16—17日,地点:意大利),东亚合作领导人系列会议(2014年11月13日,地点:缅甸),G20领导人第九次峰会(2014年11月15—16日,地点:澳大利亚)。

④ 2015年中日两国领导人共同出席的国际会议有:亚非领导人会议和万隆会议60周年纪念活动(2015年4月22—24日,地点:印度尼西亚),第六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2015年11月1日,地点:韩国),联合国成立70周年系列峰会(2015年9月26—28日,地点:美国),G20领导人第十次峰会(2015年11月15—16日,地点:土耳其),APEC第2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2015年11月17—19日,地点:菲律宾),东亚合作领导人系列会议(2015年11月21—22日,地点:马来西亚),巴黎气候变化大会(2015年11月30日—12月11日,地点:法国)。

⑤ 2016年中日两国领导人共同出席的国际会议有:第四届核安全峰会(2016年3月31日—4月1日,地点:美国),第十一届亚欧首脑会议(2016年7月15—16日,地点:蒙古),东亚合作领导人系列会议(2016年9月6—8日,地点:老挝),第71届联合国大会系列高级别会议(2016年9月13—26日,地点:美国),APEC第24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2016年11月19—20日,地点:秘鲁)。

⑥ 2017年中日两国领导人共同出席的国际会议有:G20领导人第十二次峰会(2017年7月7—8日,地点:德国),APEC第25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2017年11月10—11日,地点:越南),东亚合作领导人系列会议(2017年11月14日,地点:菲律宾)。

国都重视大国外交,希望与大国建立稳定、友好的双边关系。中方强调在外交布局中“大国是关键”,日方则坚持与西方大国的“共同价值观”,尽管双方外交战略与指导思想大相径庭,但重视大国外交、巩固并与其发展关系的初衷,两国则是一致的。另一个群体是中国的邻国或与中国接壤的周边国家。这些国家都是中日两国希望交好的国家,他们希望借助中日两国经济发展之力并获取相当数额的援助,但又不希望在不时发生摩擦的中日关系中明显划线,孰轻孰重,选边站队,因此成为中日两国外交争取与角力的对象国。这种状况在中日两国领导人出访东南亚、中

亚国家和蒙古国时表现得最为明显。应该说,笔者对中日外交重合度所反映出的这种现象并不感到意外,它基本上与目前中日两国的综合国力、国际地位、对外政策和外交取向是相一致的,是两国外交的一种必然选择。

研究中日两国的外交战略与特点,特别是运用数据统计方法对其进行细致的量化研究与分析,有助于进一步明辨对手,知己知彼,适时调整策略,对提高我方外交效能、拓展外交成果无疑是有益的。

编辑 李 亚 邓文科

A Reanalysis of Diplomatic Strategies and Characteristics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Centered on the Visits of Leaders of the Two Countries in 2013—2017

LU Yi¹ LI Tingyu¹

(1.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Beijing 100091, China*)

Abstract: Follow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new governments of China and Japan, the leaders of the two countries attached great importance to diplomatic work. In the past five years, the leaders have paid visits across the world. The paper adopts statistical quantification method to draw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two leaders' visits in the following aspects: the basic situation, characteristics, diplomatic purposes, and overlap ratio of diplomatic tie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re are distinctiv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leaders of the two countries in diplomatic strategy, first visiting country, purpose and priority of the visit. A high degree of overlap ratio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in diplomatic ties reflects an explicit competitive situation, and two kinds of regions are in fierce competition, namely major powers and neighboring countries of China.

Key words: leaders of China and Japan; diplomatic strategy; visit characteristic; overlap ratio of diplomatic ties